

中国军事翻译史论纲*

王祥兵^{1,2} 穆雷²

(1.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湖南 长沙 410074; 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 广州 510320)

摘要: 军事翻译见证了战争与和平,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军事翻译史作为对军事翻译活动的记录, 理应受到重视, 但是本文梳理中国翻译史研究文献后, 发现中国军事翻译史的研究严重不足。笔者对这种现状进行了反思, 并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论纲性地构思了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的路径, 彰显其重大现实意义, 同时为将来书写中国军事翻译史奠定基础。

关键词: 战争与和平; 中国军事翻译史; 研究内容; 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13)01-0084-07

1. 引言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战争绵延不断。据统计, “从地球上出现文明以来的 5000 多年中, 人类先后发生了 15000 多次战争, 有几十亿人在战争中丧生; 在这 5000 多年中, 人类只有 500 年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中。也就是说, 每 100 年中, 人类最少有 90 年是生活在战争状态中。”(楚云 2004:1)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两条主线, 战争时期存在和平的期盼, 平时时期也有战争的阴影, 国防安全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说: “语言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转引自刘禾 2009:1), 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翻译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 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交流碰撞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部翻译史, 其中军事翻译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参与了军事冲突, 见证了战争与和平, 见证了文明的碰撞和发展。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 在文明的强势与弱势、中心与边缘日趋紧张的对峙和碰撞中, 不同文化的军事冲突中存在大量的翻译因素, 翻译在冲突中可以起到塑造冲突走向的重要作用(参见王宏志 2007, 2010, 2011, 2012; Baker 2010; 罗天 2011a), 这种局势凸显了军事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 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现状反思

翻译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复杂的活动之一, 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上曾经并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影响。翻译史研究是翻译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也是翻译学中的一个有机构成元素。“尽管对翻译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 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专门记载过往翻译活动的翻译史书籍在 20 世纪前都相当匮乏。”(李德超 2007: VII)

上世纪中叶以来, 随着人类对翻译活动越来越重视,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逐渐确立, 翻译史研究的文献渐渐多了起来。笔者利用中国知网(www.cnki.net)的“学术期刊”的检索功能以“翻译史”为“主题”进行“核心期刊”文献数量的检索, 不限年限, 结果为 361 篇(截止 2012 年 9 月 17 日); 利用网络检索到 82 部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与翻译史研究有关的专著(截止 2011 年 12 月), 绝大部分是在 2005 年之后出版的; 穆雷、杨冬敏等人统计到 1993~2012 年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有关翻译研究的 690 篇博士论文中有 175 篇与翻译史研究相关, 占统计总数的 25.3%。另外, 文军主编的《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1880—2005 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索引》一书中收录了 1880~2005 年间与翻译史研究相关的论文、论著 924 篇(部)(文军, 胡庆洪 2007)。这些数据有的还没有公开发表, 也可能是不完全统计, 但能说明一些问题。

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近些年来中国翻译研究中翻译史研究的勃兴, “翻译史研究已成为当今国内翻译研究的主流之一”(穆雷, 蓝红军 2011)。早在 1951 年, 翻译前辈董秋斯就呼吁中国翻译学界要写成

* 本文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对象”项目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政策对国家文化战略的作用与影响研究”(批准号 12BYY015)的阶段性成果。

两部大书：一是中国翻译史，二是中国翻译学(董秋斯 2009:608)。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翻译史的大书”已经出版了多部，研究的内容几乎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翻译活动，翻译史研究正在从翻译研究的边缘向中心移动，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正在日益增加，逐渐凸显其对翻译研究其他领域的启示和影响作用，以及翻译史研究本身在翻译学学科建设中的基础地位。

穆雷(2000)在十几年前概述中国翻译史研究状况时说：“[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内容广泛，涉及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翻译流派、翻译人物、翻译作品，几乎包括了翻译史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时间跨度从中国古代一直到现在，既有通史，又有断代史，既有汉译外史，也有外译汉史，民族翻译、佛经翻译和西学翻译三个历史时期都有论述，文学翻译与科学翻译也有专论。从国际学界的现状来看，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处于领先地位的。”她通过对当时已经出版的 13 部中国翻译史专著的分析发出了“重视译史研究，推动译学发展”的呼吁。时至今日，翻译史的论著出版了几十部，翻译史的论文发表了几百篇，可谓硕果累累。

表 1: 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文献统计表

类别	数量	文献信息
专著	1	《军事翻译家刘伯承》(陈石平, 成英 1988)
专辟章节论述中国军事翻译史的文献	4	《中国口译史》中第三章“军事战争中的口译”, (黎难秋 2002:154—176)。
		《中国科学翻译史》第一编“中国科学口译史”第十章“民国时期(1912~1949)的口译活动”(黎难秋 2006:175—179)
		《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部分第一卷)(哲学社会科学的翻译篇第 9 章“军事”)(马祖毅 2006:375—397)。
		《晚清军事需求下的外语教育研究》(第六章“晚清军事翻译”)(栗进英, 易点点 2010:141—175)
博士论文	2	《晚清西方兵学译著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闫俊侠 2007)
		Surviving in the Violent Conflict: Chinese Interpreters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 (Guo Ting 2009)(英国)
期刊文章	39	
直接论述军事翻译史实	6	“抗战时期的翻译与战时文化”(邹振环 1994)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during the Opium War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1839~1942)”(王宏志 2007)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 上篇: 中方的译者”(王宏志 2011)
		“滇缅战役中的军事翻译”(罗天 2011a)
		“分割的权力, 各异的翻译——从权力话语的角度看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罗天 2011b)
		“通事与奸民: 明末中英虎门事件中的译者”(王宏志 2012)
军事作品的翻译和传播	4	“军事翻译的巨匠 军事改革的先驱——评新书《军事翻译家刘伯承》”(晋琇 1988)
		“《战争论》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任力 1991)
		“晚清编译德国军事著作活动考评”(孙立峰 2007)
		“近代中国对西方军事著作翻译述评”(商海燕 2011)
军事译员介绍或回忆录	28	林则徐(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方译员组织者)、马礼逊、马儒翰(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翻译)、郭实腊(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翻译)、艾嘉略(法国传教士,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翻译顾问)、张元济(早年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伍修权(现代著名军事翻译家)、杨刚(翻译《论持久战》的女翻译家)、凌青(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军事外交翻译家)、夏文运(日本关东军翻译)、刘伯承(元帅级军事翻译家)、周锡卿(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翻译员)、高文彬(远东军事法庭国际监察处翻译员)、徐坚(著名军事记者翻译家)、刘祖慰(抗战时期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译员)、孙维韬(军事文学翻译家)、蒋百里(著名军事学家)、黎成德(“飞虎队”陈纳德将军的贴身翻译)、滇缅战役中国远征军译员(左和金、梅祖彦、王瑞福、张良皋、曹越华、程君礼等)、王乾德(抗美援朝战争翻译员之一)、柴成文(朝鲜停战谈判中方联络官)、张泽石(朝鲜战争中战俘翻译员)、过家鼎(朝鲜停战谈判中方译员)(限于篇幅, 本部分文献出处在“参考文献”中从略)
较早系统介绍军事翻译	1	“浅谈军事翻译的地位和作用”(吴树凡 1991)

然而,笔者依然发现翻译史研究存有缺憾,至少是军事翻译史研究的缺失。军事翻译历史悠久,最早明确提及军事口译员服务是在希腊文学有关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征战亚洲(最远到达印度)的叙述中找到的,距今有近2500年的历史(Bowen et al. 1995:263)。在目前所看到的中文资料里,军事领域中记载的口译活动,最早可上溯到公元608年的隋代,距今近1500年(黎难秋 2002:154)。“在全球许多军事行动中对语言及文化符号系统的关注已到达一个中心位置上,因为这种信息对于国际冲突双方的情报都至关重要……翻译在牵涉到战争时期的跨文化交流和宣传等活动中发挥着中心地位的作用。”(Tymoczko 2007:26)(笔者译)但遗憾的是,与军事翻译密切相关的军事翻译史的研究却严重滞后,笔者对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的几个方面作了不完全统计(截止2012年8月),如表1所示。

从现有的这些有关中国军事翻译史的研究,我们看到以下几个不足:

1)从研究成果的类别来看,当前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缺少系统性,显得零散。按照通史、断代史或思想史、人物史等类别来系统研究、描述中国军事翻译史的专著几乎是空白。

2)从研究的广度来看,中国军事翻译史的研究尚不全面。有限的一些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晚清及民国早期这一段时间的军事翻译活动,对中国古代和现当代军事翻译的研究比较欠缺。就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涉外战争而言,除对鸦片战争中的军事翻译研究较多(但深入研究此课题的学者非常有限)以外,对抗日战争、朝鲜战争中以及其他战争中的军事翻译研究很不充分。

3)从史实发掘的深度看,大量的翻译活动史实还没有得到发掘和研究。有待发掘的领域有:1928~1938中德军事合作时期;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朝鲜战争(1950~1953)时期。在这些时期有许多外国军事顾问、军事专家来到中国,在武器装备、军事谈判、项目合作等方面涉及到了大量的翻译活动。

4)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缺乏丰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分析视角。以上提到的大部分相关文献还只停留在单纯的对史料的梳理上,没有对军事翻译的定义、内涵、属性、特征及其影响等进行探讨,也没有借鉴相关学科如社会学、军事学等学科的理论对军事翻译的史料进行深入分析,更没有自觉运用翻译学这一所属学科常用的基本方法如定性定量研究、描述性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等方法对军事翻译进行深入系统的科学研究。

笔者认为,产生这些不足的原因有以下三种:一是由于军事翻译通常有涉密的性质以及军事译者强调集体性的身份,这使得军事翻译话题很少进入学术圈进行交流,军事翻译研究课题难以进入翻译学术中心这一状况造成了军事翻译长期在战争史和军事史中缺席的状态,而在翻译史中也仅仅充当陪衬的角色。尽管近年来也召开了一些以军事翻译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但是相对而言,这些会议在学术界影响甚微。二是军队中从事翻译研究的专业人才非常有限,未能充分挖掘利用军事翻译史料,形成一种研究局面。三是目前国内翻译史(包括军事翻译史)研究对方法论的运用重视不够,单纯梳理史料到一定程度便再难深入。笔者认为,在当今新军事变革日趋深入的形势下,中国军事翻译史的系统深入研究亟待展开。

3. 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构思

3.1 研究内容

吴树凡把军事翻译内容分为下列四项:1)军事理论翻译:有关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文献资料翻译;2)军工技术翻译:关于各种武器和装备的研制、生产、使用、保养以及军事工程等方面的文献资料的翻译;3)军事情报翻译:对用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手段获取的外国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情报材料的翻译;4)军事涉外翻译:军队与外国敌军或友军交往接触中的口译和笔译(吴树凡 1991)。作为军事翻译史的研究内容与作为军事翻译的研究内容,在研究方法上应区别开来。进行翻译史研究时,一方面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历时性的描述;另一方面需要从历史的视角对它们进行研究,选择那些有特定历史意义的翻译活动进行考查,发掘影响军事翻译活动的因素,揭示军事翻译活动的规律。

军事理论包括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两个门类。世界上各国都注重引进、研究和借鉴外国军事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的战争指导思想、建军方针、防务政策、军队条令条例的重要参考。翻译在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促进了中国整个军事体系的变革,这一段历史应该在中国军事翻译史中得到充分体现,可以写成断代史或专题史,如“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翻译史”。

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最直接的构成要素之一,引进和吸收外国先进军工技术是增强战斗力的重要

手段。在这个引进和吸收的过程中,军事翻译的作用不可替代。据统计,1871年至1895年间,晚清官办和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共出版军事译著97种,其中以武器装备类为最多,有51种,约占这一时期所译西方军事著作总数的52.6%(闫俊侠2007:76—77),这充分说明军事装备翻译在国防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同样可以写成专题史,如“中国军事装备翻译史”。

军事情报是战争的灵魂,通过各种手段获取的外军原始信息材料要想成为优质情报,必需经过翻译和分析提炼的过程。现代战争中,战争体系的信息化程度已成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军事情报翻译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军事情报翻译史对现代战争部署和国防安全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要比较全面地勾勒中国军事翻译史,还可以增加几个领域的研究。

5)军事文学翻译研究:包括对各种军事题材文学作品的翻译研究。

文学的作用是给人带来精神的力量。译介优秀外国军事题材文学作品,对于借鉴国外的斗争经验,鼓舞斗志以及加强国民的军事思想教育,都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从翻译史的视角深入研究军事文学翻译如何在主体文化里面运作,探讨译介活动所能产生的文化力量,以及译介活动和主体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6)军事译员研究:包括对军事资料笔译、军事活动口译等相关人员的研究。

翻译史的重点在于译者,所以翻译史的写作需围绕译者生活及其经历过的社会环境展开。在军事翻译中,军事译者经常以集体面目出现,他们的主体性通常由于强大的国家政治和军事目的而被掩盖了,可以通过撰写军事翻译史研究军事译者,构建军事译者的身份和主体性。安东尼·皮姆(Anthony Pym)认为:“翻译史的中心对象应当是作为人的译者,因为只有人才承担起社会因果的责任,只有通过译者以及他们的委托人、赞助人、读者等及其社会环境,才能理解为什么译作产生于那特定的社会时代和地点。”(Pym 2007: xxiii)

7)军事翻译口述史研究

由参加过战争的军人或为战争服务过的译员口述笔译和口译等翻译活动对战争进程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同时进行录音或录像,把这些录音和录像作为军事翻译口述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其中不仅仅是对译员本身的了解,更多的是对战争双方对于翻译所采取的态度、政策、支持力度、译员培养等多方面的描述和了解。

8)军事翻译教育研究

对军事翻译教育的研究应主要包括军事翻译教育本体研究,军事译员素质研究和军事翻译教育的历史研究三个方面。军事翻译教育史的研究把军事翻译教育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中进行历时的考察,揭示军事翻译教育与战争、与和平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时期的特点。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军事翻译史的研究内容丰富充实,我们可以书写中国军事翻译史的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人物史,断代史可以书写中国古代军事翻译史、中国近代军事翻译史、中国现代军事翻译史,或是晚清军事翻译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军事翻译研究、朝鲜战争中的军事翻译研究等;专题史可以书写中国军事装备翻译史、中国军事情报翻译史、中国军事文学翻译史、中国军事翻译口述史、中国军事翻译教育史等;人物史可以书写重要军事译员的个人传记,也可以描绘军事译员的群像。

3.2 研究方法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两种基本方法,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可用于军事翻译史研究的定性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法、档案研究法、历史分析比较法、理论思辨法、访谈法、口述史法等。

文献法即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与中国军事翻译史相关的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信息,以达到调查研究目的。它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选取适用的资料,并做出恰当的分析和使用,把散落的史实按一定的主题逻辑连贯成篇,联结成史。

档案研究法即利用档案材料进行研究的方法。档案材料中的许多内容,包含了某些尚未公开的重要信息。通过某些档案材料,我们可以更加清晰、有效地回溯和洞察历史事件及其社会背景。档案馆(包括国外档案馆)收存的大量中国军事翻译第一手史料还未充分得到利用,发掘这些零散的档案资料,对其加以分析研究是军事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例如郭婷(2009)的博士论文 *Surviving in Violent*

Conflicts: Chinese Interpreters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使用了大量档案资料,其中很多都是由她第一次使用于翻译研究当中,这些档案资料还原了历史真实,增强了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历史分析比较法即将某一历史事件与另一相关事件或某一历史因素与另一因素进行分析对比以寻求某一结论性的解释。将此法应用在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上,可以将一些重大的军事翻译活动或事件进行纵向或横向比较,从而多方位、多层次地认识某一军事翻译活动或事件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变迁规律。比如王宏志(2007,2011)通过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中方译者和英方译者的横向对比,展示了晚清社会横断面的结构特征,从军事翻译的角度揭露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最深层社会原因。

理论思辨法即通过纯理论分析或逻辑推导的方法进行研究,此法可用于厘定军事翻译和军事翻译史的基本概念与范围,论证军事翻译与社会背景、战争冲突、国防安全之间的关系。

运用访谈法,可以有效地收集一线军事译员的现场工作情况与体会,记录并分析,重建历史真实。比如郭婷(2009:203-212)利用访谈法对抗日战争中的军事译员严嘉瑞进行专访,获得第一手资料,揭示抗日战争中军事译员的生存状态。

中国军事翻译史的书写还可以运用口述史法,既可以利用已有的也可以创建新的口述史资源,这些资源能为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提供宝贵的第一手史料。《在同一面旗帜下:中国二战老兵回忆录》(邓贤2005)通过52位曾经参加过中、印、缅战区抗日战争的老兵“一段段近乎自言自语的回忆”(同上:1),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有几位在战争中做专职译员的老兵关于军事翻译的口述,其他老兵的口述中也有许多军事翻译的细节。这些是非常珍贵的中国军事翻译史史料资源,对这些口述材料的分析和重构,可以形成对当时军事翻译和社会的认识新视角。

定量研究主要指通过对特定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来研究问题的方法。应用于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可以对军事翻译活动或成果进行共时或历时的统计,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量分析以揭示中国军事翻译某个时期或某个方面的特点和规律。比如下面这份《民国时期科学译书学科统计表》(黎难秋2006:459)便是一例(突出显示为笔者所加):

表2:民国时期科学译书学科统计表

	英	法	美	俄	德	日	总译书量(含未知原书国别者)
社科总类	60	12	81	37	22	84	486
哲 学	100	48	155	113	85	71	672
政 治	149	16	252	185	69	205	1418
法 律	15	12	25	17	10	102	288
军 事	34	19	64	89	105	166	784
经 济	168	49	213	161	71	306	1328
文 化	/	/	/	/	/	5	88
教 育	34	7	226	14	15	61	586
历 史	72	22	75	44	24	114	559
地 理	44	19	39	7	2	31	215
自然科学	171	48	284	33	54	244	1197
医 学	50	1	102	14	10	165	675
农 业	4	2	16	0	5	53	142
工业、交通	25	6	47	11	12	47	386
中小学教材	0	0	75	0	1	34	163
传 记	44	21	106	65	32	42	523
心理学	23	5	71	1	8	10	147
综合类	/	/	/	/	/	/	14
总计	993	287	1831	791	525	1740	9671

从这个统计表中,关于民国时期(1912~1949)的军事翻译,可以提出下述问题:1)民国时期的军事翻

译与其他学科的翻译相比在社会上占据什么位置?为什么?2)民国时期的军事翻译从英、法、美、俄、德、日的哪个国家中译书量最大?你能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社会政治现实对此作出解释吗?3)从这个统计表中,你能对当时的国际权力格局作出初步分析吗?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能让我们对军事翻译与社会、国际关系的互动有更清晰直观的认识。

3.3 几点强调

3.3.1 深入挖掘史料

“一个翻译史研究课题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翻译史料之运用;而成功运用翻译史料的前提与关键则是能搜集到足够多的、系统化的翻译史料”(郑锦怀,岳峰 2011)。如何获得足够多的、系统化的中国军事翻译史料呢?所有军事史料可分为书面的、实物的、口头的、民族志学的、语言学的,以及电影、录音和照片(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1985:502)。研究者应尽可能从这些史料载体中获取第一手资料,特别注意通过采访资深军事翻译专家,抢救他们对重大军事活动翻译的记忆,走访档案馆和博物馆以及重大军事活动纪念馆,还可以与一些重要的军事出版社进行合作,并注意从国外的出版物中获取相关资料文献,利用中外史料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横向对比,获得更大的观察空间,构建立体的历史叙事。

3.3.2 做到史论结合

“史”作为历史材料,是反映历史本体的内容,它是进行历史理论思维的基本素材和对象,突出的是其客观性。“论”是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论证得出某一观点的结论的过程,是有关历史本体的认识论内容,突出的是理论性。缺少了“论”,翻译史的书写就成了翻译史料的简单收集和整理甚至堆砌。可见,对史料的研究只有上升到“论”的高度,史论结合,才能真正认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实现历史研究的真正价值。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理论主要为翻译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话题,以及语境设立的范围。如果将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则可能成为束缚研究者的障碍,导致历史研究的循环论证。因为翻译史研究的结论是通过史料阅读和分析来得出预设,并非由既定理论来决定,其目的也不是论证既定理论”(夏天 2012)。

对“论”的强调不仅指理论,还有方法论。方法论意识是引导我们走向规范、系统研究的重要路径。方法论的正确应用,能够保障军事翻译史研究的科学性和严密性从而完成描写军事翻译行为、解释军事翻译现象、预测军事翻译未来趋势的史学研究任务。

4. 结语

研究中国军事翻译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以从翻译这个独特的视角认识中国的军事史和战争史,认识翻译在战争中的作用;二是对中国军事翻译的历史进行梳理和总结,促进军事翻译学术研究的系统开展;三是随着中国军队在国际维和、联合军演、军事外交、尖端武器、公海护航、国际新秩序等方面的活动的日益频繁,军事翻译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需要从军事翻译的历史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以史为鉴,加大翻译为军事服务的力度和广度。理论意义体现在一是扩展了翻译学、社会学、军事学、历史学这几门学科之间交叉领域研究的空间;二是开拓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军事翻译史的书写奠定基础;三是弥补中国军事翻译史在翻译学领域研究的不足,丰富翻译学学科内涵,促进翻译学向前发展。

本文就中国军事翻译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设想,以此呼吁各个领域的学者加强对中国军事翻译研究的力度,并为书写中国军事翻译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参考文献:

- [1] Baker, Mona. 2010.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in the war zone: Narrated and narrators [J]. *Translation and Violent Conflict*, special issue of *The Translator* 16 (2): 197-222.
- [2] Bowen, Margareta et al. 1995. War and Peace [C]// Jean Delisle & Judith Woodsworth.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UNESCO Publishing: 263-273.
- [3] Guo Ting. 2009. *Surviving in the Violent Conflict: Chinese Interpreters in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1~1945)* [D]. Aston University.
- [4] Pym, Anthony. 2007.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5] Tymoczko, Maria. 2007. *Enlarging Translation, Empowering Translators*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6] Wong, Lawrence Wang-chi. 2007.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during the Opium War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1839~1942) [C]// Myriam Salama-Carr.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Conflict*. Amsterdam-New York, NY: Rodopi: 41-60.

- [7] 陈石平,成英.1988.军事翻译家刘伯承[M].北京:书海出版社.
- [8] 楚云.2004.78个世界著名战役——胜败全纪录[M].北京:时事出版社.
- [9] 邓贤.2005.在同一面旗帜下:抗日二战老兵回忆录[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
- [10] 董秋斯.2009.论翻译理论的建设[C]//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11] 晋琇.1988.军事翻译的巨匠 军事改革的先驱——评新书《军事翻译家刘伯承》[J].军事历史(1):62—63.
- [12]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1985.简明军事学科词典[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 [13] 李德超.2007.《翻译史研究方法》导读[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4] 黎难秋.2002.中国口译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
- [15] 黎难秋.2006.中国科学翻译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16] 刘禾.2009.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M].杨立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 [17] 罗天.2011a.滇缅战役中的军事翻译[C]//王宏志.翻译史研究(第一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23—249.
- [18] 罗天.2011b.分割的权力,各异的翻译——从权力话语的角度看抗战时期的翻译活动[J].外国语文(4):82—85.
- [19] 马祖毅.2006.中国翻译通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 [20] 穆雷.2000.重视译史研究,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J].中国翻译(1):44—48.
- [21] 穆雷,蓝红军.2011.2010年中国翻译研究综述[J].上海翻译(3):23—28.
- [22] 商海燕.2011.近代中国对西方军事著作翻译述评[J].大家(6):27—29.
- [23] 栗进英,易点点.2010.晚清军事需求下的外语教育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 [24] 孙立峰.2007.晚清编译德国军事著作活动考评[J].德国研究(2):59—66.
- [25] 王宏志.2010.“我会穿上缀有英国皇家领扣的副领事服”——马礼逊的政治翻译活动[J].编译论丛(1):1—40.
- [26] 王宏志.2011.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上)[C]//王宏志.翻译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27] 王宏志.2012.通事与奸民:明末中英虎门事件中的译者[J].编译论丛:中国翻译史特刊(1):41—66.
- [28] 文军,胡庆洪.2007.中国翻译史研究:回眸与前瞻[J].上海翻译(3):65—69.
- [29] 吴树凡.1991.浅谈军事翻译的地位和作用[J].上海科技翻译(2):12—14.
- [30] 夏天.2012.史料、语境与理论:文学翻译史研究方法构建[J].外国语(4):80—87.
- [31] 闫俊侠.2007.晚清西方兵学译著在中国的传播(1860~1895)[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 [32] 郑锦怀,岳峰.2011.翻译史料问题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3):445—452.
- [33] 邹振环.1994.抗战时期的翻译与战时文化[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3):89—94.

收稿日期:2012—10—15

作者简介:王祥兵,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军事翻译。穆雷,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翻译教学。

(责任编辑:杨淑华)

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 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纪要

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2012年11月9日晚在河海大学闻天馆举行。会议由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王守仁教授和常务副会长张杰教授主持。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蔡斌教授首先向理事会做了本年度年会筹备工作汇报,王守仁教授代表学会对河海大学外院为承办会议所作的细致认真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与参加会议的理事讨论确定了关于本次年会安排方面的一些细节问题。

学会秘书处向与会理事汇报了学会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包括通过学会年检、参加省社联活动、参与华东六省一市外文协作会议等事务内容,并向理事会呈交了新申请入会的会员名单。经理事会成员讨论表决,通过了新增会员名单,并接受了江南大学理事人员的变动申请。

王守仁教授结合自己去南昌参加华东六省一市外文协作会议的经历,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外文协作会明年在青岛举办的外语教学研讨会。

张杰教授因出任江苏省外国语言学会会长,向理事会提出辞去学会常务副会长一职。经理事会讨论,同意张杰教授辞去学会常务副会长并继续留任学会常务理事,决定由姚君伟教授接替担任学会常务副会长,吕洪灵教授担任学会秘书长。

在本次理事会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何江胜教授向理事会提出了承办下届年会的申请。理事会经讨论同意,确定下一届年会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召开。(江苏省外国文学学会秘书处供稿)